

第 6 卷第 5 期 2013 年 12 月

Vol. 6, No. 5, December, 2013

# 国际高等教育

## 招收国际学生

商业社会的国际学生争夺战.....	157
寻求中介之争的解决方案.....	161
国际招生：监督和标准.....	163
国际招生：道德挑战 .....	165
中国学术界的公然诚信.....	<b>Error! Bookmark not defined.</b>

## 高等教育国际化

教授：国际化的关键 .....	171
-----------------	-----

## 非洲的高等教育

非洲政府和高等教育治理改革.....	173
肯尼亚的高等教育新改革.....	176

##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体制：理想和现实.....	179
跨境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问题.....	182

## 私立高等教育

波兰顶尖私立大学面临的挑战.....	184
--------------------	-----

##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成立.....	186
查韦斯的统治为委内瑞拉高等教育留下的遗产.....	188
加强老挝的高等教育 .....	190
俄罗斯大学的新使命和新意愿.....	192

新书快递 .....	194
------------	-----

---

## 商业社会的国际学生争夺战

Philip G. Altbach、Liz Reisberg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Liz Reisberg: Reisberg 教育咨询公司主席

电子邮箱: reisberg@gmail.com

全球学生流动已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目前约 300 万学生在国外学习, 为全球经济贡献了 750 多亿美元。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理由很多, 其中包括他们渴望在国内劳动力市场竞争中提高自身就业能力、在国内找不到相关的学习机会, 以及移民等其他原因。

各国及各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动机也很复杂, 并且越来越商业化。许多国家和院校都要依赖招收国际学生以平衡学校财政预算。在澳大利亚等国家, 政府政策将国际高等教育 (包括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教育以及在海外开设的分校机构等)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收入来源。英国也将国际教育收入视为财政来源, 向非欧盟国家的外国学生收取更高的费用。美国的大学也在逐渐将国际教育收入视为财政来源。至少有两个州 (华盛顿州和纽约州) 正在考虑向国际学生收取更高的学费。

最近的研究显示, 在美国等许多主要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里, 国际学生占绝大多数。其中的一篇研究指出, 在一些美国重点大学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 95% 以上的研究生是国际学生。许多美国大学都依赖国际学生担任研究生助教和助研等工作。

### 获取信息和指导

当一个学生想到国外学习时, 学生的传统做法是选择一个目的国, 研究各个院校、地理位置、学位的可获得性以及成本, 并直接向有意向的学术机构提出申请。过去, 多数要去国外留学的人都是为了获得研究生文凭或专业文凭, 而且一般家里还有些海外关系。如果信息可靠, 这个通过人际网络搭建起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就能运行得很好。此外, 想留学的学生可以向大量由政府 and 大学赞助的中介寻求额外的信息和支持, 例如美国教育服务中心 (Education USA)、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the British Council)、法国教育服务中心 (Campus France)、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等。这些组织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设立了办事处, 提供所属国家与学术机会相关的客观信息。随着互联网和大学网站的崛起, 从网站上搜索大学信息变得更加容易了。

由于过去十年留学生的数量大幅增长和多元化, 这种搜寻机会和信息的方法不再能够满足那些国际化程度相对有限的国家中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学生和家庭的的需求了, 特

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学生。

许多大城市都有专业的留学申请私人顾问，他们为目标学生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留学机会。这些顾问还会指导学生完成他们所不为熟知的申请程序。最专业的顾问掌握很多海外院校和招生实践的相关知识，努力根据学生的需求、学术能力和目标找到与之匹配的留学目的地。他们向学生收取服务费用。尽管他们可能为了掌握最新信息而发展与世界各地招生负责人的关系，但没有与任何国外大学签订协议。这些顾问中，很多人隶属于国际研究生招生顾问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Admissions Consultants）等专业组织，顾问们常在这些专业组织中收集数据、分享经验并界定实践的道德标准。

### 中介组织与招生捷径

近来，最明显同时也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留学中介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中介和招生专员为特定大学服务并将学生引荐给客户机构。在中国和印度，支付佣金聘用中介和招生专员已经成为一项大生意，这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没人确切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在业的中介机构，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同时这些机构的活动也不受规范约束。多数中介机构的员工都是创业者，除了掌握客户大学的信息，他们对学生留学目的国的高等教育知识一窍不通。也有少数大型中介机构拥有国际分支机构、承接国际项目，例如名为“IDP 国际教育中心”的澳资公司在全球都有业务。但多数中介机构都规模很小、员工不多。

从本质上来说，中介机构为一定数量的大学服务，并按照招生数计算佣金。佣金数量不一，但大致为首年费用的15~20%，约

4 000~6 000 美元或者更高。很明显，这很有吸引力，以刺激中介机构向学生推介一些特定的大学。一些美国大学雇用大量中介机构。例如，辛辛那提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在网站上列出的中介名单超过120个，单在印度就有46个中介机构。

### 问题所在

然而，要对出国留学机会及相关信息做细致研究，这无疑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问题在于：怎样获取所需信息和支持？怎样辨认风险？无论是对学生来说还是对希望招收国际学生的大学来说，寻找中介机构都是捷径，但雇佣中介也带来大量难题。

首先，无法确保中介机构所推荐的大学是否是学生的最佳选择。更直白点说，很难想象当中介机构靠A、B、C三所大学的佣金维持生计时会为学生推荐S大学。事实上也很难想象除A、B、C大学之外，中介机构还会去了解其它项目。

此外，虽然定期检查并非不可能，但还是很难知道中介和学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些轶事报道表明，许多中介机构通过修改学业记录、代写申请、准备推荐信等可疑的方式来“帮助”客户。据统计，80%的申请人都受到过中介机构类似的“帮助”，其中包括伪造证书等。

在某些情况下，中介机构会同时向学生和大学收费，从职业道德来看，这样的做法是有问题的。

### 谁来判定道德与否？

非营利组织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Council）创立于2008年，起初是中介共同体和雇用中介的大学两方的利益代表，后来开

始为达到委员会道德标准的中介机构进行认证服务。认证费用非常昂贵,一开始需要交2 000美元的申请费(不退还)以及5 000美元的预认证费,然后要负担评估小组的差旅费和3 000美元的首年会员费。会员资格每年要经过年检,年检费用为2 000~3 000美元。这致使认证成本远远超过了许多小型中介所的预算。

有关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的众多关注点之一是这个组织完全是自行验证的,那些成为会员的大学和中介受益于认证为其道德所做的担保。创建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中介服务提供道德担保。关于认证方法和结果的有效性却并没有独立的证明。

2013年6月,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Admissions Counsel,成立于1937年,集合了美国大学入学咨询的专业人士)经过两年的研究,发布了一份针对中介机构和招生专员的报告。由于来自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成员大学的巨大压力,报告避开了此前的一个说法,将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成员“不会”与中介共事的说法改成更缓和的“不可以”与中介共事。2013年秋召开的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年度论坛将对该报告进行讨论。

美国大学注册与招生人员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已经组建了一个特别小组,研究国际活动相关的招生和其它活动的专业标准。

人们要求大学公开其与中介机构的合作内情,这是最低层次的基本道德义务。然而,中介机构也需要告知学生及他们的家人——

他们与大学签订合同并且代表这些大学为学生提供信息,不能假装自己是上文所描述的专业招生顾问。

## 可以做些什么?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国内和国际学生的入学过程不应该纵容中介机构和招生专员。因此,学生应该对最适合自己的大学有广泛的了解,并且也应该了解中介机构会引导学生选择少数支付了佣金的大学,从中获利。此外,入学程序中产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似乎很大、也很明显。

选择去哪里留学决定于家庭资源和学生的时间。学生及其家庭需要把握主动权,忽略任务的难度,不要把命运交给中介机构和那些可能不把学生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

国际学生流动是大众现象,需要一个兼顾多面的方法。许多措施已经在实施了,但需要巩固和加强。

- 大学有责任提供信息丰富、恪守诚信、用户友好的网站,发布与学术项目、招生程序、毕业要求、成本和客户服务相关的明确信息。

- 大学必须指派员工回复招生过程中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告知信息、提供帮助。这需要一定的成本,但如果可以把目前用于中介机构的部分预算分配到这上面,经费将会用得更好。

- 留学生接收国/地区的大学和其它学术组织应该在网站上公布有关学术体制和国际学生学习机会的明确、完整的信息。

- 政府必须增加对那些位于主要留学生输出国的教育信息中心的支持,从而让受过良好训练的员工能在招生工作坊和宣讲会现

场提供信息。

- 对于那些不受佣金影响，提供客观的学习机会信息并仔细评估申请人需要、将申请人与适当的学术项目匹配的专业教育顾问应区别对待，不与中介机构混淆对待。

- 大学应该向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看齐，阻止学生及其家庭将决策权交给中介机构。

## 结论

毫无疑问，全球学生流动对于国家、学术机构很重要，对学生个人的重要性尤甚。关键在于保证学生能够获得最好的学习机会。

## 寻求中介之争的解决方案

Rahul Choudaha

世界教育服务社 (World Education Services) 研究和战略发展部主任

电子邮箱: rahul@wes.org

委托中介机构招收国际学生已经引发大量争论, 其中观念各异, 不仅存在一些激进的观点, 也有一些式微的行动点。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dmissions Counseling) 最近的报告调查了收取佣金提供服务的国际招生中介机构, 试图通过一个综合兼顾的方式为这些争论带去一股清风。尽管每个人都能在支持或反对雇佣中介机构上说点什么, 但我们大多数人需要寻求解决方案。同时, 该报告适当回应了争论中常被忽略的两种批评意见, 并含蓄指出了未来的方向: 多样化和透明化。

### 院校、学生和中介机构的多样化

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的报告发现, 正是由于其他国家都雇佣了根据佣金收入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因此, 这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在美国, 国际学生高度集中在研究型大学。美国有约 4 500 所授予高等教育学位的院校, 其中只有 108 所归在卡耐基分类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活动高度活跃)”一类中, 然而这些大学集中了五分之二国际学生。其中大多数院校都不涉及中介机构之争, 因为这些学校在国际学生心目中的品牌能见度很高, 他们还将雇佣中介机构这件事视为影响品牌形象的风险。当然, 也有辛辛那提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这样的例外, 这些大学很早就采用了中介模式。

有关雇佣中介机构的讨论总体上主要针

对这 108 所研究型大学以外的院校, 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的那份报告也是如此。那些院校中的公立大学对招收国际本科生越来越感兴趣。不断缩减的国家财政支持让国际本科生成为高校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而雇佣中介机构也被定位为招生的有效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院校匆忙启用中介机构, 而不考虑学校想要录取的学生类型是否匹配以及那些学生怎样做出求学选择。

世界教育服务社的报告《不是所有的国际学生都一样》(Not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the Same) 回应了信息代沟的问题, 提出要更好地了解学生。该报告按照经济资源和学业准备两个维度将国际学生分成四个层次: 探索者 (explorers)、奋斗者 (strivers)、挣扎者 (strugglers) 和高飞者 (highfliers)。这四类学生有不同的信息需求; 这决定了他们是否会雇佣中介机构以及他们雇佣中介机构的原因。例如, 只有 24% 的探索者 (经济资源充足, 学业准备差) 反映自己雇佣了中介机构; 相比之下, 只有 9% 的奋斗者 (经济资源少, 学业准备好) 雇佣中介。

中介机构在可靠性和道德行为上的质量良莠不齐。由于市场情报、资源和能力的各种压力, 部分学生和院校可能仍然想与中介机构合作。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任何与之彻底决裂的做法都是不切实际和不公平的, 因为会忽略院校的不同需求。同时, 声称收费中介机构对所有类型的院校都适合,

也是一句大话。

## 院校的责任

是否雇佣中介机构的决策取决于院校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无论作何选择，都不代表不道德或者不合法。然而，以自治为基础的职业责任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这也是中介机构模式增加风险的地方，可能导致中介不把付费学生、甚至院校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说到底，对中介机构而言没有招生就没有佣金。

考虑一下在中介机构和学生的关系中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世界教育服务社即将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对国际学生进行了调查，询问学生：“你们的教育顾问有没有向你们提及他们是否向院校按招生人数收取佣金这回事？”只有14%的受访者反应他们的教育顾问是向院校收取佣金；43%浑然不觉；43%回答“不知道/没法说”。

研究结果显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掌握更多信息）为那些收取佣金的中介机构带来不公平的优势，其代价是院校的品牌。同时，也可以看到，要向中介及其在其他国家的分支网络管理和推行“诚信行为准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院校这一边肩负起树立透明度标准的责任就变得愈发重要了。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的报告建议“向学生和家庭提供有关中介机构和院校关系的明确信息”。雇佣中介的高校必须走上前来，在网站上明确声明他们是否与中介机构合作、他们向中介机构付出了多少佣金，并将这些信息向有意申

请的学生公开。例如，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给学生明确提供了这一信息，并公开了其向中介支付的佣金数额。

对那些雇佣中介的院校，严峻的考验在于前瞻性地公开他们和中介、申请者之间的服务承诺。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很自信，他们又需要隐瞒什么呢？对透明度的强调将弥合信息不对称，并树立起一个院校标准，即雇佣中介没什么秘密可言。

## 结论

针对如何能主动、快速地招收到国际学生的讨论越来越多，许多人都在找解决方案和指导原则。全球的中介机构网络都将自身视为所有院校的万能灵药。但事实依然是：雇佣中介以提高国际学生数量的应急方案可能会增加院校品牌、录取标准甚至学生质量等方面的风险。

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的报告试图调查并强调有关雇佣中介机构的几个问题，其中包括院校信息公开、透明度和诚信。但同时，这并没有解决激励性薪酬有关的核心问题，例如“佣金不能达成一致”等。

这让那些雇佣或考虑雇佣中介机构的大学生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大学想要通过雇佣中介机构以招收符合要求的学生、促进决策过程，并推动大学制度建设等。此外，院校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树立信息透明度的标准，克服秘密行动和信息不对称的顽疾。

## 国际招生：监督和标准

David Engberg

美国国际教育服务组织 Global Opportunities Group 执行总监

电子邮箱: dave@g-o-group.com

雇佣中介机构招收国际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仍然是一个争议话题。反对者认为，向中介机构付费与固有的国内招生行动相矛盾，物质激励会促使中介机构将其经济利益置于学生的学业利益之上，并带来更多的申请欺诈。支持者声称，通过向多元市场开放入学机会、促进国际学生来源多样化，与中介合作不仅花费更少还比自行管理国际招生风险小。

2013年5月，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发布了一份针对国际招生的很有预见性的报告。报告详细陈述了商业中介的相关问题，但建议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取消对会员院校雇佣中介机构的禁令。

报告自从发布之日就遭到辩论双方的广泛批评。那些反对与中介合作的人认为，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冒着将收入放在学生利益之前的风险，牺牲自己的正直和信誉。支持解除禁令的人，主要是抱怨报告没有推动针对美国的国际招生标准和质量的讨论。

这些批评的作用尤其显著。由于（1）美国院校对国际招生需求的急速上升，特别是本科层次，（2）国际学生（或他们的政府）支付全额学费的能力，以及（3）许多院校面临的财务挑战等原因，可以预测，更多的学校将会努力招收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并雇佣第三方中介帮助他们。

### 现状

众所周知，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校都雇佣中介机构招收国际学生。这两个国家都有成熟的法制系统监管中介机构和大学的关系，但美国却并非如此。联邦政府针对这方面的回应较为模糊。受政府资助的 Education USA 在世界各地开设办公室，但他们被禁止与商业招生中介合作，担心这样做会造成偏见；为大学和商业招生中介牵线搭桥的活动将美国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都牵涉了进去。除了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Council，非营利机构，创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华盛顿），美国再没有什么致力于监管国际招生的组织了。

根据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其使命是发展有关国际招生的道德行为标准，对那些决意遵循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标准的中介机构进行认证，并发展最好的培训服务，以帮助中介机构和大学更好地服务于学生。中介机构所要获得认证必须完成一份自评报告，经历一次现场评估，并通过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理事会的投票。认证的有效期为五年，在此期间通过认证的中介机构可以使用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的标识对其服务开展营销活动。一旦被认证，中介机构必须提交年度报告才能维持良好地位，并按年支付会员费。五年之后，他们必须重新完成整

个自评和外部评审程序才能再拿到认证。

由于美国没有其他组织积极参与国际招生标准的发展和监管，因此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的工作值得称道。但是，他们的认证程序在几个重要方面存在缺陷。首先是耗时且昂贵。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的网站可以指导中介机构为长达八九个月的认证程序做计划，首年花费 10 000 美元。此后，小的中介机构（年招生人数低于 500）必须每年支付 2 000 美元的会员费以维持认证；大的中介机构的年费为 4 000 美元。小型“夫妻店”仍然主导着许多国家的招生中介市场，特别是亚洲。他们的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认证和会员费五年共计为 20 000 美元，这意味着多数都不会寻求认证。

另一个问题，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标准的主观性使其很难被量化和评估。例如，是否能够评估出一个中介的所有雇员都“胜任、消息灵通、有信誉并且总是将申请者和院校的利益放在首位”吗？在决定中介是否有效管理财政、是否诚实宣传、是否管理好分支机构时，所有或者部分招生过程是遵照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标准来推进的吗？

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的评估/认证过程是设计用于认证和中介机构的，而不是针对在中介机构工作的人。因此，认证对于保障那些与学生互动的顾问是否确实理解了美国高等教育体制、招生办公室的功能或美国移民体制的细微差

别等，作用不大。美国国际招生委员会或者另一个美国组织或许可以在提供针对性训练或认证上做得很好。针对性训练可以参考国际教育和博览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 for Education and Fairs）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在欧洲的工作，认证则可以参考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专业资源组织（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为那些负责美国学生实习的顾问们所做的工作。

### 未来的道路

最终，对那些意图与国际招生中介合作的美国教育机构，我们给出的最好建议是：发展自己的工作标准和规范。辛辛那提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堪萨斯州的卫奇塔州立大学（Wichita State University）等一些大学已经成功地这样做了。不过，由于在与中介的有效合作上准备不充分，多数院校都没成功。例如，在许多院校，国际招生和录取都由个人负责，这种安排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此外，许多大学缺乏审查、签订合同以及评估中介绩效的政策，即使是那些努力招收国际学生的大学也一样。因此，如果不考虑那些参与制定中介标准和质量保障的外部组织，那些选择将国际招生外包的学校就必须制定适当的计划和行动才能达到自己的招生目标。

## 国际招生：道德挑战

Daniel Zaretsky

加拿大国际高等教育咨询公司 Higher-Edge 创意总监。(Higher-Edge 总部位于多伦多，是一个国际高等教育咨询公司)

电子邮箱：dani@higher-edge.com

2013年5月，美国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组建的国际招生委员会发布了撰写的报告(报告请参见：<http://www.nacacnet.org/media-center/Documents/ICR.pdf>)。该报告探索了以佣金为基础的国际招生合同的争议领域。但是，把关注重点放在佣金支付上却会产生误导。最令人不安的违规行为是中介机构向学生收取费用，而不是与大学向中介机构支付费用有关。问题在于，院校缺乏对国际学生招生行动的监管，包括与中介机构签订合同等。除了明确规则，院校接下来还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保证招生过程在公平的环境下运行。

### 所有中介都收取佣金吗？

教育中介是指招收国际学生的公司或个人。教育中介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隶属于旅行社、移民咨询公司或其他商业机构。

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的报告将教育中介机构清晰地分成三类(参见报告第40页)，但还需要额外的术语。那些只向院校收取佣金或其他形式费用的中介机构被列为“院校招生中介机构”。那些只向学生收取费用的中介被列为“学生中介机构”。那些既向院校又向学生收取费用的中介被列为“混合收费中介机构”(报告的第13页称之为“两栖中介”)。

### 什么是违规行为？

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的报告将付费委托招生(例如按照招生人数收取佣金)与“一系列不正当行为表现”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参见报告第10页)。但是，招生过程中充斥着更为严重的违规行为，例如广泛存在的虚假，学术和财务文件的篡改，以及在全球实施的入学考试中试图进行的系统性欺诈。

广泛存在到什么程度？英国伦敦《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3年6月13日刊登的一篇有关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的文章总结道，“中国申请人向西方大学提交的推荐信中，90%都是伪造的”(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news/fraud-fears-rocket-as-chinese-seek-a-place-at-any-price/2004704.article>)。这些违规行为受到那些付费留学咨询的学生及其家长的认可。

因此，的确需要制定政策，以应对那些发生大量欺诈行为的国家。

### 佣金是问题所在吗？

院校支付的佣金增加了对不正当行为的激励。一些中介机构“操纵”学生从申请一个不收费或几乎不收费的学校或专业，转到申请一个向中介机构支付一两千美元甚至更

高费用的学校或专业。中介通常代表了许多学校，但这些学校的付费数额不一。

一个更有利可图、大把赚钱的方式是向学生收费。填写申请表等日常服务的收入很高。上面提及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的那篇文章指出，中国的中介机构向学生收取高达10 000美元的费用，并且偶尔会有学生为了被排名靠前的大学录取而翻倍交费。高昂的佣金可以用于伪造文件或安排考试作弊。此外，虽然中介机构知道学生可能会被学校拒绝，但是由于学生不切实际的录取愿望，中介机构仍然能够向学生收取高额费用。

大学心知肚明：向他们提出申请的多数外国学生都不会踏足他们的校园。有经验的中介机构也心知肚明：多数申请留学的学生可能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学业，可能用另一家中介，可能去不在中介推荐列表上的另一所院校，或者也可能被拒绝签证。由于只有很少比例的申请学生最终会为中介机构带来收入，许多中介都倾向于尝试通过申请过程而不是申请结果向学生收取更多的费用。在中国和印度，中介机构从学生那里收取的费用远远高于院校支付的佣金。

### 欺诈的根源是什么？

在更大范围的不道德行为中，例如伪造学业记录和考试作弊（如SAT），根本问题在于学生（常常包括家长）想在录取（或奖学金）上争取优势。中介机构在指导或实施这些行为中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当2013年5月韩国在全国取消SAT考试的时候，《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3年5月9日的报道称，作弊的动机来自家长（请参见《华尔街日报》网站<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127887323744604578472313648304172.html>）。类

似的，想留学的高中生引起的分数贬值猖獗也不是中介的过失。学校只是为了满足家长让孩子用高学业成绩扩大被国外大学录取的机会。

### 解决方案：监管中介

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提交的《委员会建议》中，有关“良好行为原则的声明”的内容正确强调了大学信息公开。院校所应该做到的信息透明度，应当远远超过声明所建议的程度（第45页）。申请过程应该要求学生做诚信声明，并详细描述不诚实的后果。学生应该被明确告知何为不可接受的行为（例如篡改或伪造学业记录）。应该要求学生公开自己是否接受了第三方的帮助以及自己得到了什么帮助。应该提前告知那些被录取的学生：到校后将验证英语能力测试的结果，学生会接受简要面试并被要求写一篇短文。

在雇佣中介机构时，协议必须明确条款和限制，不正当行为将导致协议终止，并可能提交司法程序。应该按照学校要求定期开展核查。

这些措施的成本很低甚至无需成本，所以没有院校能以资源短缺为借口拒绝这些措施。除了这些措施以外，院校可以凭借运营规模，在有问题的国家部署专家团队，核查中介机构的协议是否兑现。学生们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建议？中介费用是否遵循院校的协议？学生咨询服务是否反映了大学的准确信息？文件是真的吗？当然，这项任务并不简单。中介或家长可能会递交伪造的文件，而学生可能成为不知情的共犯。院校可能没与中介签订合同就通过他们接受学生的入学申请。但是，这一挑战只是加深了对不走捷径的谨慎招生战略的需求。

## 解决方案：合理的制度

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的报告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重点考虑的是院校严肃对抗不端行为的能力和/或意愿（第42页）。

全国大学入学咨询师协会对“意愿”一词的使用是在质疑：事实上“能力”是否是问题所在。院校与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越频繁，学生就越少，收入就越低——这不是院校的态度问题，而是一个精明的认识。

培训、认证或给中介机构发放许可的组织缺乏强制实施规则的能力或资源，这为院校逃避严肃的信息公开带来了便利。这种逃避引发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政府加大监管力度。

院校财政倚赖国际学生收费严重破坏了对招生行为的严格监管倾向。录取不合格的学生、在课程通过率上给学生放水、与中介机构甚至海外院校进行暧昧交易，这些不顾

一切的行为都会在长远上损害院校的声音。

## 结论

其实，的确存在很多经济利益刺激中介机构的不良行为。对佣金支付的重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试图让人们从更大的问题上转移注意力。在招生录取过程中，许多申请人向中介机构支付大笔费用以抢占先机。特别是在少数几个造假严重的国家，中介机构通过剥削那些真诚但缺乏信息或容易操纵的留学申请者来获取大量经济回报。问题的另一方是那些教育机构，即使可能会有违学术标准，他们也迫切想要收取国际学生所能支付的费用，故意忽略中介、学生和家长的不良行为。

整顿国际招生领域是很有意义的，但这需要院校为相关责任付出经济代价，并只收取诚实的回报。

## 中国留学申请中的诚信问题

Jon Marcus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驻北美通讯记者

电子邮箱: jmarcus@hechingerreport.org

中国南京市江苏国际预科学院的一位名叫焦一舟(译音)的17岁学生希望去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学习环境工程。

但是,像许多大学申请者一样,他很担心入学考试和申请文书。他知道其它中国学生在申请中作弊,甚至说服老师伪造中学成绩和推荐信,据说还有学生雇佣中介机构撰写申请文书。

焦一舟说:“这种事并不能困扰我,因为我按正确的方式行事。大学主管们也不傻,他们知道哪些申请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但是,西方大学入学机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数每年都在上升。大学招生主管们的确很担心专家们说的情况:欺诈行为广泛存在且越来越多。

琳达·麦金士·布雷迪斯(Linda McKinnish Bridges)是美国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驻华招生副主任兼项目发展总监,她说:“我并不想出言讽刺,毕竟每个学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我去过的一些学校都跟我说,‘我们会竭尽所能与你们合作,把这些学生送到美国去’。”

根据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和Zinch中国(Zinch China,总部位于美国的教育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申请人向西方的大学提交的推荐信中,90%都是伪造的。

上述两个组织访谈了中国重点中学的

250名学生,他们总结到:70%的申请文书都不是申请人自己写的,一般的中学成绩单都被篡改过,许多奖项和成就也是假的。

研究人员说,“欺骗性的申请在中国到处都是,背后的推动力量是过度竞争的家长和争强好胜的中介机构”,这些中介通过将学生送进西方大学获得奖金,这是“发展趋势”。

他们说,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中国中产阶级家长们决意将孩子送到国外学习,他们当中有80%的人向中介机构付钱寻求帮助。目前的行情是,每个学生要支付高达10000美元的佣金;如果能把学生送进《美国新闻和世界周报》排名(U.S. News & World Report rankings)前列的大学,佣金翻倍。

Zinch 中国和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文化规范将一个17岁的青少年视为无法对本科教育等重要事项做决策的人。”正如布雷迪斯博士所说,中国家长们“只有一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他们会倾尽所有只为帮她/他拔得头筹”。

研究人员称,中介机构将亲自或者雇佣刚刚从西方大学回来的留学人员甚至那些在中国侨居的英语国家的教师们代写申请文书,市面上存在不同的文书代写服务。

中国的官员们也承认这个问题。罗伯·克其瑞(Rob Cochrane)是江苏省教育厅的国际项目经理,在澳洲出生,他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关注点”。但是,他也指出该责备的是申请程序。克其瑞先生说:“正是远程提交

的申请程序为不道德的人提供了可能伪造证书的机会。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第二语言申请人,让这些申请人进行书面申请的想法本身就充满了危险”。

中国也不是唯一一个被指在申请西方大学时欺诈的国家。今年5月,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the US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取消了SAT入学考试在韩国的预订实施计划。据报道,那些考试补习班提前拿到了试卷。Cochrane先生说:“问题在于程序,而不是那些申请人。”

无论原因是什么,所有这些欺诈行为都大大增加了大学招生主管们工作的复杂性,来自中国的申请堆积成山,大学又亟需招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获得所需的学校财政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估计,中国留学在外的学生有44万,美国和英国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国。

到目前为止,中国往美国输送的学生比其他国家都多,每年约20万名,约为2000年的四倍。换句话说,美国四分之一的国际学生都来自中国。过去五年,数字每年上升20%。尽管英国的签证政策有变,但前往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也在继续上升,去年上升了8%。

在维克森林大学,过去五年该校收到的中国申请从每年79份上升到每年600多份。Bridges博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拜访中国的中学,并和其他的招生顾问通过Skype对学生进行面试,同时让学生完成作文测试——这些都是为了消除欺诈。她说:“如果学生能力强,我会对英语能力特别留意。如果由于学生不能理解而导致我必须用普通话说,那么那个学生就不能来维克森林大学。”

Zinch中国咨询公司开展的另一项调研测试了25000名即将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

语言能力,结果发现三分之二的学生在课堂讨论中英语口语不流利。去年的这一比例是38%。英语能力“强”的学生比例从18%下降到4%。

克其瑞先生说,中国学生在托福等标准化测验中是如此出色,以至于“公平地讲,只要精心准备和练习,他们可以获得比自己的实际交流水平还略高的”分数。

克其瑞先生预测,公开讨论欺诈行为问题可能会改变中国学生留学申请的现状。“我们这边已经就这个话题谈了很多了。在这里欺诈是规范所不允许的,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来问我这个问题。中国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他们不希望有人鄙视自己的教育体制。”她说,一个解决途径是要求中介进行认证;另一个解决途径是向中国学生收取难以伪造的电子版学业档案。

在西方,如果那些没有为英语学习准备好的中国学生不断涌来,这些问题就必须需要得到解决。全自费的中国学生可以去那些需要钱的大学,但此后让他们退学的代价将抵消这笔收入。布雷迪斯博士说:“无法保留学生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可以改变这一问题的动机是保留率和损耗率。”

学生去西方留学结果却没拿到学位就回来了,或者他们篡改成绩被抓个现行,这些丢脸的事可以改变中国中学的行为。布雷迪斯博士说,她不再接受某所学校的申请,因为那所学校的校长告诉她/他可以为了让学生去西方大学留学做任何事。

她说:“如果这些学生是被某位热心的校长、某个热心的中介机构、某个热心的家长推到那种境地并败北归家,那时候(中国人)就会将之视为一个长期问题。”在南京,焦一舟的同学朱义(译音)正期待着去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求学。他说,他

也知道其他中国人欺诈，“(欺诈)是真的。  
但不是每个人都那样做。多数人都用正确的  
方式行事”。

注：本文最初发表在《泰晤士高等教育》  
杂志上。

## 教授：国际化的关键

Gerard A. Postiglione、Philip G. Altbach

Gerard A. Postiglione: 香港大学教育学教授, 华正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gerry@hku.hk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大学继续将教授往国际化的方向定位。教授是大学的特征, 他们在帮助驱动知识经济的过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在那些希望更紧密对接全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 这一点尤其突出。但是, 国际化对很多国家而言都是一把双刃剑。不发展国际化的大学很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过, 国际化扭曲了人才流动的平衡, 将人才向少数几个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倾斜集聚。为了将全球化利用到极致, 各国教授都需要更多地提升国际化形象和态度。目前, 各地的学术职业对深入国际化的意愿似乎都止步不前。

在大学工作的教师是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这一点似乎很明确。毕竟, 教授们在海外校园授课, 为授权专业打造课程体系, 与海外同事合作开展研究, 并迎接国际学生来校上课, 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成果等等。事实上, 没有学者们全力以赴、积极热情的参与, 国际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没有教师的参与, 国际化的努力常常会引发高度争议。例如美国的耶鲁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和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 这两所大学的校长制定了重要的国际化方案, 但很快就引发校园争论。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的很多教师也质疑过该校的全球化计划。还有很多其他的例

子表明, 教师拒绝履行大学分配的国际化任务, 对班上的国际学生缺乏热情, 总体上并不对许多大学所声称的国际化使命买账。因此, 保证教授的参与才是挑战所在。

然而, 两个针对教授的国际调研数据显示, 有关国际化的一系列指标都令人百思不解。

### 数据说明了什么

两个重要的国际研究调查了教授的价值观和看法, 一个是1992年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开展的, 另一个是2007年的“学术职业改革调查”(the Survey of 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两个研究分别调查了14和19个学术体系。

这些研究询问了大量教师关于国际化承诺和兴趣的问题。美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 学术生命要孤立得多。多数美国学者在美国获得学位, 包括最高学位。尽管其中大量学者在外国出生在美国工作, 是最可能开展国际合作的人, 但是与外国开展合作研究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只有28%的美国学者在美国以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成果, 仅有10%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发表过成果。

然而, 美国的大学和日韩的大学不同,

美国为外国出生、外国训练的教师敞开大门。事实上在多数国家，学者几乎都是所在国的公民，非所在国公民的比例只有个位数——即使是美国，也只有9%。其它一些英语国家的这一比例在某种程度上要更高，例如英国是19%，加拿大12%，澳大利亚12%。只有一些欧洲国家是特例，例如荷兰、挪威，这些国家的出入境反映出欧盟的新现实。中国香港地区的体制相当独特，43%的学者是非所在国公民，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城市能最大密度的集中全球排名前列的大学。

除了国籍之外，博士学习所在地也驱动着国际化。在2007年调研的八个国家中，超过70%（多达72%）的学者是在另外一个国家而不是在受雇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而在1992年的调研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是那样。日本、美国等是例外，这两个国家的多数学者都是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

几乎所有地区的学者们都声称他们在教学和研究中很强调国际化的理念，这不应该令人意外。很多人将国际化的内容融入到课程中，但是参与国外研究和教学的人就没那么多了。在很多国家，拥有海外教学经历的教师比例还不足10%。只有香港或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才有大量学者在别处教过学。因此，学者对国际化的态度并不会阻碍一个国家对其大学进行国际化的努力，教师的实际参与才更加关键。

发达国家的学者们常常抗议大学打造国际化校园的努力。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研究

型大学的教授在走向国际网络的道路上常常面临政府控制带来的阻力。令人意外的是，自1992年的调查以来，许多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学者比例下降了。各种原因耐人寻味。新晋学者比他们的前辈们合作更少，各地的新晋学者也不大有在国外教学的背景。事实上，最高产的学者（以学术成果发表量计）是那些参与了最多国际化合作的学者，合作形式包括共同发表论文、在国外发论文等。不过，美国是例外，美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学者和不参与国际合作的学者在研究生产力上差别更小一些。

教授国际化是大学体制的经济驱动力，国际调研指出教授国际化存在一个重要阻碍。不像那些政府驱动或教授驱动的体制，在市场化的经济体中，有很高比例的学者将大学视为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他们也更有可能将自己的大学视为受无能行政人员管理的机构。这自然对大学归属感很高的教授职位不利。其结果意味着教授对所在大学领导层的国际化愿景（比如海外校区）认同度不高。

从更积极的一面看，1992年以来，除了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所有被调查国家国外发表成果的人数都增加了。在墨西哥、巴西（大体上是英语国家）等国家，用外语发表成果的人数增加得更多。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指出：尽管国际化是必然趋势，但是全球学术职业的国际化思想程度要比预期低。

## 非洲政府和高等教育治理改革

N. V. Varghes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法国分部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教育治理和管理部主任

电子邮箱: nv.varghese@iiep.unesco.org

高等教育被视为值得公共支持的“公共物品”，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十年中，多数国家为大学扩张采取了国家资助和大量补贴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财务危机出现后，公共经费减少，大学走向破败，硬件设施因此而老化——学生入学人数减少，教学标准降低，研究能力耗尽。复兴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多数改革重新定义了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以及院校治理和管理中的角色。大学治理从“国家控制”模式转变成“国家监管”模式。一方面，院校自治空间扩大；另一方面，又要依赖市场工具的刺激和信息公开机制来引导院校达到政策目标。其中一些改革帮助扩张了高等教育体制，使其重获新生，并且改进了院校治理。

### 非洲的政府和治理

非洲高等教育和西方一样，以政府资助和管理的院校为中心。因此，政府控制是非洲大学治理演变出的最普遍的模式。政府首脑兼任大学校长的情况在一些国家很普遍。非洲国家意识到依赖政府拨款带来的限制之后，引入了几项改革来扩宽财务选择，试图达到扩张体制和改革并更有效治理和管理院校的目的。

这些高等教育改革减少了政府对院校的控制，让院校自治，并且把院校往市场的方向推。过去二十年间，公立院校的大量私有

化和私立院校的广泛扩张反映了这一趋势。结果，非洲公立院校的自费生（不受政府资助）和私立院校的额外招生数量和所占的比例不断增长。

许多国家建立了一些缓冲组织来支持政策实施、资源分配、绩效监管和信息公开保障。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非洲国家都建立了国家高等教育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s of Higher Education) 或类似机构。在以法语为母语的 国家，更普遍的做法则是组建单独的高等教育部。不过一些法语国家的这一趋势也正在改变，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在建设之中。然而，这些委员会似乎更多扮演顾问的角色，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并不具备类似机构在其他英语国家中那么实质性的地位。

### 院校自治和新的治理

院校自治被视为政府控制和市场运营之间的调停机制。自治帮助大学维持了公立院校的形象，同时也将市场原则贯彻到运营中。自治要求大学自行设置优先事项、改进战略、发展专业和课程、选拔大学领导人、招聘员工、拓展经费来源、决定内部资源的分配标准以及按照规则分配资源。

伴随自治权的获得，院校层面要建立新的治理结构和问责措施。治理委员会被组建起来监督一所大学的整体运作，决策有关员工招聘、领导任命和财务问题的 事项。法语国家的治理委员会常常由内部人员组成；英

语国家却有大量校外成员，有时还包括国际专家。在肯尼亚等国家，院校层面和学院层面有不同的管理委员会。

新的问责措施包括战略规划、结果导向管理、绩效合同、绩效指标、监督和评估报告、大学审计以及外部和内部的质量保障机制。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国家认证机构，一些院校也正在建立内部的质量保障单位。

## 治理改革及其影响

毫无疑问，改革使处于破败状态的大学找到了生存战略。私有化措施（回收成本、谋求收入的行为）帮助许多非洲大学挺过了20世纪90年代，并在21世纪的头十年取得繁荣。例如，改革首先帮助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走出绝境”，后来又改善了大学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提高了入学人数，增加了学者工资，阻止了员工流失，改善了课程的市场关联，并减少了大学对政府拨款的依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分部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的研究显示，非洲的高等教育治理改革帮助院校减少了对政府的依赖，让院校聚焦于服务市场需求和当地需求。这些改革也帮助拓展了资源渠道，将内部资源分配去中心化。在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一揽子拨款替代了一条一条以预算为基础的资源转换；加纳的公立大学有望筹集预算需求的30%；尼日利亚已经引入了竞争性的研究拨款。绩效监控增加了南非的研究产出，改善了加纳的运营效率；同时，肯尼亚的绩效合同也促进了问责制度的实施。

改革让公立大学运营的方式和结果都更加以市场为导向。改革似乎扩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并随之扩大了就业市场上的机会不平等。市场化进程青睐那些有能

力付钱的人，在平等问题上却不够友好。由于大学面临的扩张压力更多地来源于财政上的考虑而不是教育上的考虑，市场导向似乎促进了大学企业化和高等教育的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

许多改革都受到发展伙伴的支持。改革似乎在帮助减少大学对国家政府依赖的同时，也增加了大学对外部机构的依赖。需要更细致的捋清政府、院校和外部机构三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及其背后的脉络，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 结论

20世纪90年代引入的改革帮助非洲高校生存下来、体制得到扩张，2000年以后该地区的高等教育也经历了全球最快的发展。改革的市场导向无疑动摇了大学传统的活动组织和机构治理方式。在这股惯性的作用下，非洲的大学显示出回弹力，并成为变革过程的一部分。

围绕自治和市场导向展开的改革对领导力提出了新的问题。大学层面的领导力面临着平衡扩张和质量改进、平衡学术优先事项和财务考量、平衡效率和平等问题，以及平衡本土关联、全球标准和排名等一系列挑战。大学权力和权威的交接并不总是伴随着加强领导能力（有效治理、高校运行）的措施。

体制的快速扩张、教育提供者的增加以及学习项目的多样化，都对系统的治理和管理提出了挑战。外国教育提供者的进入以及教师、学生和学习项目在地区内外的流动，都迫切需要和谐、质量投入和全球标准建设的重点关注。这些挑战可能不会得到市场力量的有效回应，因为他们需要基于长期视角而不是短期财务考量的政策。因此，所需要的不是远离政府，而是让政府更积极地参

与到发展一个面向未来的运行框架上去，其 管理高校。  
目的是规范体制，而不是获得经费、控制和

## 肯尼亚的高等教育新改革

Ishmael I. Mumene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教育学副教授

电子邮箱: Ishmael.Munene@nau.edu

在教育大众化时代,保障教育质量是一项巨大的政策挑战。肯尼亚最近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大学法案 2012》(the Universities Act 2012)试图让在运营中实行自我规范的公立大学和需要服从严格规范约束的私立大学一起推行质量保障。新法规指出,虽然私立大学正当壮年,但是公立大学已经开始有衰老的迹象。目前,肯尼亚有约 23 所发展成熟的公立大学,在校生人数超过 19.7 万名; 28 所私立大学,其中 15 所持有特许证 (charters), 13 所持有临时委任状,私立大学的在校生人数超过 3.7 万名。

尽管政府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原则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大学的发展战略,但之前的高等教育法案未能解决公立和私立大学中不断涌现的挑战。新法案试图通过一个三管齐下的战略,让以下三个与质量相关的领域平分秋色: 监管、招生和去政治化治理。

### 监管认证

为了保障对所有的大学的监督,新法案支持建立“大学教育委员会”(the Commission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该委员会的监管权力覆盖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学。到目前为止,只有私立大学必须达到物质设施、师资队伍和学习资源的严格条件要求后才能从大学教育委员会获得特许状。这样,尽管私立大学

的质量在不断改进,但是公立大学的质量却恶化了。私立大学的扩张得到管制的同时,公立大学却在全国各地大开假分校,虚张声势以支撑不断萎缩的盈亏底线。一所只能负载三万学生的公立大学,在校生竟然达到约六万人。

现在,所有公立大学都被要求在 2013 年 7 月前向大学教育委员会申请获得特许状。申请特许状的要求非常严苛,包括:大学各专业的生师比必须合理,保证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人占恰当的比例,具备一流的科学技术课程实验室,升级图书馆,合理发展分校区。公立大学如果不能达到这些质量指标,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法学教育理事会 (the Council for Legal Education) 收回了授予内罗比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 法学院的认证,莫伊大学 (Moi University) 法学院则进入待定状态。相反,所有私立大学的法学院都通过了认证。同样,肯尼亚工学院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 of Kenya) 拒绝接收来自肯雅塔大学 (Kenyatta University) 和辛德穆里诺科技大学 (Masinde Muliro University of Science of Technology) 的毕业生。肯尼亚医学实验室技师协会 (the Kenya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ist Association) 也拒绝接收肯雅塔大学医学技术专业的毕业生。这些专业教育机构完全不能担保自身课程和设施的真实性。

## 招生

到目前为止，公立大学已经通过联合招生委员会（the Joint Admissions Board）招收了所有受政府资助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是满足联合招生委员会标准的最优秀的高中生，他们在公立大学就读能够获得很多补贴，每年只需交付400美元学费；相比之下，私立大学受私人赞助的学生要交2000美元，其他学生要交4000美元。许多受政府资助的学生必须在公立大学就读，不能就读医学、工程和法律等有竞争力的专业。相反，那些录取分数较低的学生和自费生却能够上热门课程，比如公立或私立大学中受私人赞助的考生。富人有选择，但穷人没有。一个原本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体制，最终却在惩罚弱势群体。

新法案废除了联合招生委员会，建立了“肯尼亚院校招生就业服务中心”（the Kenya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entral Placement Service）来管理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学的招生。受政府资助的学生将有资格选择公立或私立大学的心仪专业。该机构将会和高等教育贷款委员会（the Higher Education Loans Board）合作，决定哪些学生够资格获得助学金和贷款，并为所有学生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其直接影响是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额外的院校和专业选择，同时增加所有大学和专业学生的多样性。

## 去政治化治理

国立大学享受的相对优势包括最小限度的监管、学生拨款和招生，这些都源于他们享受到的政治上的“照顾”。在以往的法律中，每所大学都按照自己制定的章程运行，让政府首脑或其提名人来做大学校长。大学的董

事会成员和副校长（首席执行官）由校长任命。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政府可以操控大学往特定的方向发展而不考虑对学术质量的影响；同时，大学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取重要的好处。因此，公立大学的副校长自动成为大学教育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但这个委员会又只监管私立大学。为了顺应高等教育需求的高涨，政府坚持进行扩招，然而这有时会超出公立大学的承受能力。

《大学法案2012》废除了单个大学各自的章程，不再像从前那样任命公立大学的校长，并取消了公立大学副校长在新的大学教育委员会中的成员资格。现在，大学校长由校友会和教授委员会任命，校长要做具有高道德标准的大学领袖。副校长们将由大学委员按照市场竞争原则选择任命。其目的是将大学的行政管理去政治化，同时巩固内部共同治理，因为内部共同治理是促进质量保障的关键手段。

## 质量保障的难题

增加学生选择、重新构建治理结构可能是高等教育重建中比较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新法案能否从根本上改进肯尼亚高等教育的质量，这还有待观望。只要大学教育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且政府继续在大学决策中扮演关键角色，就不难预料市场的作用不过是雁过无痕。例如，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3月，短短六个月间，政府就将公立大学的数量从八个增加到了23个。此外，即使严峻的人才短缺已经让现有大学很受困扰，但2013年3月选出的47个新的县级政府都在试图建立新大学。值得注意的还有，除了斯特摩大学（Strathmore University）和美国国际大学（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之外，所有私立大学都模仿公立

大学建立分校，全国各地散布着被人鄙视、资源短缺、财源滚滚的分校。肯尼亚山大学（Mount Kenya University）是最大的私立大

学，连公立大学都赶不上它办分校的速度，它甚至还在南苏丹和卢旺达都建立了跨国分校。

## 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体制：理想和现实

Juma Shaban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马里共和国巴马科办公室主任

电子邮箱: j.shabani@unesco.org

从2000年年中开始,非洲陆续实施了一系列行动计划,以发展可比、统一的评价标准体系,促进学术流动。质量和质量保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分析了非洲的各种高等教育质量体制,并简要讨论实施质量保障的挑战及各国愿景。

人们普遍认同,一些非洲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在过去二十年里降低了,原因在于在校数量的快速增长、图书馆和实验室缺乏标准、师资的教学培训不充分、质量保障机制的能力有限等。一些质量保障机构已经建立起来,旨在提高国家、区域和大陆层面的高等教育质量。

### 国家层面

1962年,尼日利亚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到2012年为止,已经有21个非洲国家建立了类似机构,另有12个国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非洲的法语国家渐渐落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只有五个建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

这些机构主要通过面对面的模式保障私立院校的专业质量。这种要求已经逐渐扩张到公立院校,保障模式也有所增加。

### 区域层面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African and Malagasy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建立于1968年,主要目的是协调成员国师资招聘和晋升的相关学术项目和政策。自2005年,委员会开始实施一项旨在调整非洲法语国家学位结构的改革,使之成为如英语国家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结构体系。然而,由于缺乏国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这一改革面临一些挑战。

“东非大学间委员会”(the Inter-University Council for East Africa) 承担着保障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这五个东非成员国达到国际可比标准的责任,通过建立和使用一个地区性的质量保障框架来实施。这个委员会推出了一本手册来指导质量保障的培训师和评估人员,这些人现在在巩固成员大学质量保障单位方面很得力。

### 洲际层面

2010~2012年间,“非洲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 与“欧洲大学协会”(the Europe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合作,实施了“欧非质量联合试点工程”(the Europe-Africa Quality Connect Pilot Project)。该工程帮助扩大了五个非洲大学的制度评估能力。“非洲大学协会”也主持了“非洲质量保障网络”(the African Quality Assurance Network),通过能力建设和“非洲质量保障同行评议机制”(the African Quality Assurance Peer Review Mechanism) 促进各质

量保障机构的合作。目前,该质量保障网络正面临财务挑战。

“非洲联盟委员会”(the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实施了三个行动计划。一是“非洲高等教育协调战略”(the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Harmonization Strategy),于2007年起实施,目的是保障质量的可比性,促进《阿鲁沙协议》(Arusha)(修订版)的实施。所谓《阿鲁沙协议》缘起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非洲国家学业、证书、文凭、学位和其它高等教育学术资格证书认证的地区性协议,1981年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决议通过并被采用。2014年3月非洲将召开教育部论坛,采纳和签署《阿鲁沙协议》的修订版。

《阿鲁沙协议》的修订始于2002年。从2007年开始,这一过程就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共同协调,目前还未完成。这个过程是在协调战略的基础上展开的,《阿鲁沙协议》的修订也很有限,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和质量保障的利益相关者在这些行动计划中缺乏参与。

根据2007年“教育部长论坛”(the Conference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通过的工作计划可以预测,协调战略的一些预期结果到2015年也不会达成。其中包括建立“非洲地区资格评价体系”(African Reg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和发展“非洲学分转换和积累机制”(an Afric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它们都是实施《阿鲁沙协议》的重要工具。

第二个行动计划是“协调非洲试点计划”(the Tuning Africa Pilot Project),其预期目的是促进协调战略的实施。该计划于2011年启动,目的是帮助五个合作区域发展一个学位证书框架,其中涉及约60所非洲大学、“非洲大学协会”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合作伙伴。

该计划专注于预期的学习成果、技能和能力。一些扩大计划作用范围的努力正在酝酿之中。

第三个行动计划是“非洲质量评价机制”(the African Quality Rating Mechanism),该计划鼓励高校在自愿的基础上按照一系列确定的标准评估自身绩效。与排名系统不同,该计划帮助非洲大学按照指定的标准分成不同类别。2009/2010学年,11个国家的32所高校以自评为基础,参与了这个试点计划。非洲联盟委员会出台的计划报告指出了该计划的一些缺陷,并建议在扩展该机制之前,重新对所有高校进行调查,开启另一个试点阶段。

## 挑战和愿景

今天,质量保障是非洲高等教育复兴所有努力的核心。这些努力导致质量保障机构数量的快速增加。然而,这些机构中至少有60%缺乏有效实施制度的人才和能力。

2006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已经组织了五个国际论坛,帮助培训了700多位专家,专家们分布在几个关键领域,例如:专业和院校层面的认证,教学和研究质量保障,院校审计和考察,在质量保障事件中运用信息通信技术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已经出版了一本质量保障培训师指南。年度会议也在人才能力建设、培养主要参与者的意识、建立新机构、促进质量保障的地区合作等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

整个非洲大陆的主要愿景是建立“非洲高等教育和研究空间”。为了报告2010年的建设进展,非洲教育发展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frica)的高等教育工作组委托开展了几个分析研究,包括针对建立非洲地区质量保障框架的可行

性研究。非洲联盟最近启动了“非洲认证框架”(the African Accreditation Framework)的建设进程。这些行动计划和“协调非洲计划”将为“非洲地区资格评价体系”和学分转换系统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结论

在过去十年里,质量保障的努力已经在非洲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有这些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重要挑战和问题需要更多关注

和研究。首先,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部分建立在实施有关资格证书相互认可的欧洲协议上。那么,《阿鲁沙协议》应该在建立非洲高等教育和研究空间上扮演什么角色?第二,非洲高等教育和研究空间的协调战略应该如何让高等教育和质量保障的利益相关者们参与进来,以深化阿鲁沙协议的实施?最后,非洲法语国家的改革可以从英语国家汲取什么经验,以建立国家和地区层面可行的质量保障机制?

## 跨境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问题

Kevin Kinser、Jason E. Lane

Kevin Kinser: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教育行政管理和政策研究系主任、副教授

电子邮箱: kkinser@albany.edu

Jason E. Lane: 纽约州立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务长

电子邮箱: jason.lane@suny.edu

随着海外分校和其他形式的外国教育前哨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扩张, 评估跨境高等教育充满挑战, 而质量保障机构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我们认为, 这挑战要比仅仅帮助单个大学的学术质量在国际上独树一帜要大得多。在某种程度上, 由于目前全球对质量没有一致的定义, 随着院校和项目不断走向跨境合作, 对质量下定义只会越来越难。

### 双国记

除了正在讨论的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制的建设问题, 外部质量保障仍然是按照国家来组织实施的。当一所院校建立一个海外分校的时候, 院校 (除了遵守本国法律外) 有责任遵守东道国/地区的法律。在我们知道的多数情况下 (迪拜和香港是两个显著的例外), 东道国/地区要么修改已有的质量保障来满足跨境高等教育的独特性质, 要么强迫校园修改运作方式来满足已有的质量保障措施。底线在于: 东道国和所在国都有自己的规则。其结果就是, 想在地理上扩张的院校必须面对一系列特殊的障碍, 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政策; 同时, 那些有责任维持所在国质量标准的院校还面临后勤上的挑战。如果不建立真正的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

那么按国制定的政策将仍然是冲突的来源。寻求更严格的标准并不会解决这一内在的困境。

### 质量在法律上的区别

如上所述, 质量很难定义。但是, 即使假设存在一个关于质量的一致定义, 院校之间也会存在法律上的区别。不是所有的院校都有常春藤大学那样的资源; 也有一些学校提供不同于世界一流院校研究导向标准的学习项目。随着私立部门出现新的教育模式, 为学生提供高品质学习机会的创新努力似乎与传统的以校园为基础的形式相当不同。几乎很少有所有院校都能遵循的标准; 即使是针对教学等所有高等教育都有的基本方面, 关于质量应该被如何测量也没什么共识。考虑到跨境高等教育的模式和功能的多样性, 如何建立所有国外分校都能遵循的质量门槛是一个难题。

### 市场力量

跨境高等教育常常被设计用于满足东道国的市场需求, 无论需求来自想拿学位的学生, 还是来自想发展国家实力的政府官员。这有充分的理由, 因为多数这种跨境活动都被指望自给自足, 或者达成当地政府的目標,

并带来一定收益。然而，文凭工厂和其它欺骗性学历提供者普遍存在，显然对其的需求常常并不一定以质量为基础。私有化进一步鼓励市场力量在教育领域运行，通过学费支付为招生数赋予货币价值。然而，不考虑市场需求的话，质量保障机构倾向于通过保障合法、可靠和可持续的高校来支持公共利益。夹在市场和公共利益的矛盾之间，要胜出就要制定强有力的法规。在多数国家，质量保障机构是一个相对较新且相对较弱的实体，市场的压力常常更加突出这些机构在其中的困境。

### 主校区的内部质量保障进程

质量保障不只通过外部监管来维持；内部进程也很需要。但是，主校区内运行良好的程序在地球的另一边却不一定能取得同样的成功。教育传统和学生的进修准备一样具有多样性，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原则之间也会存在矛盾之处。然而，在那些假设质量在国内外都通行的情况下，中心辐射型的模式是可以成功的。那么，跨境质量保障的挑战就是在国外建立和主校区一样严格的程序，同时也适当考虑当地的特色。然而，海外分校常常太小、关注点太狭窄，缺乏基础设施来做到这一点。因此，内部监督继续在相当距离内起作用。

### 信任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有一句表明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立场的名言，即“信任，但也要核实”（trust but verify）。这句话也与国际质量保障有关。多数质量保障程序假定受评估的大学都可以被信任，它们诚实地展现自己的绩效细节；即使被评估院校可能成为自己所在院校的一个

直接竞争者，身为评估人员的同行也会诚实地评估院校的活动。但是，如果缺乏巩固质量保障过程的信任，整个评估程序的真实性就有问题。在这方面，对评估的怀疑充斥在多数质量保障程序中，限制了跨国体制成功所需的牵引力。然而，太多的信任也可能成为问题。如果所在国和东道国都假设对方承担主要责任，或简单依赖于大学的内部程序来维持质量，那么就没人监督这艘船了。缺乏对国际高等教育参与者诚信的信任，没有跨境工作必要的互惠主义，国际质量保障将仍然是一个“买者自负”（buyer-beware）的世界。

### 结论

质量低劣的院校在跨境高等教育市场内存在，就如所有国家的公共和私立教育部门都存在质量低劣的院校一样。然而，通过聚焦于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话题中有关保护学生免遭不良经营者猎夺的内容，常常掩盖了有关跨境背景下质量保证这样的大问题。质量保障仍然是一个以国家为基本的现象；然而，跨境院校和项目必须与至少两个国家、两个质量保障体制打交道。这种安排强调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即全球缺乏统一的质量定义。同时，也提出了问题：市场力量、质量的合法区别以及信任的概念如何影响海外分校的质量保障？

注：《国际高等教育》每期登出一篇来自“跨境高等教育研究团队”（C-BERT）的文章。该团队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有关 C-BERT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globalhighered.org](http://www.globalhighered.org)。我们的推特账号 @CrossBorderHE。

## 波兰顶尖私立大学面临的挑战

Joanna Musial-Sadilek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电子邮箱: jmusial9@gmail.com

波兰的高等教育需求在过去数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长,从现在到2025年期间入学人数将急剧下降。正如玛瑞克·克维克(Marek Kwiek)所说,公共政策的选择将影响公共和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缩水的幅度(见《国际高等教育》2012年秋季刊)。人口统计资料表明,波兰的入学人数整体上面临威胁,尤其是私立部门。2011年,波兰的私立高等教育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在校生51.82万,占波兰国内在校生的29%。在过去两年,私立高等教育的绝对在校生人数降低了18%,占全国学生的比例降低了4%。然而,问题出现了:顶尖私立院校能够面对人口挑战、避免遭受私立部门总体上缩减的命运吗?人口下降的第一年没能毁坏顶尖私立院校。20所顶尖私立高校的入学人数只显示出8%的跌幅,占波兰总入学人数的比例上升了3%。

### 私立高等教育面临的人口挑战

波兰和欧洲一样,公立高等教育比私立高等教育更受青睐。公立高等教育地位高、正统,为全日制学生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教育。相反,私立高校总体上地位较低,没有那么多正统性,提供低质量的教育,而且还收取大量学费。需求降低后,公立院校可能会降低学生选拔要求,逐渐接收那些从前由私立院校招收的学生。

然而,人口挑战对于私立高等教育部门来说并不是一面倒的。波兰是一个绝佳的可

用于考虑分支部门区分的例子。波兰的私立高等教育有很大分化,明显存在一小部分“准精英”私立院校。然而,那少数几所顶尖院校的招生人数在私立院校的招生总数中比例并不小:2009年,波兰330所私立高校中,顶尖的20所招生占比达到20%(顶尖前10的高校占比10%)。

这些顶尖院校也具备一般私立院校的一些总体特征,这使得它们可能遭受人口变化的伤害。首先,它们的科学研究有限,制约了他们的学术正统性和地位,让它们对那些符合公立院校入学要求的学生没那么有吸引力。第二,更明显的是,私立高校的全日制学生要支付很多学费,但公立院校不用付学费。随着适龄人口数量下降,进入公立大学变得更加容易——多数公立院校必须招收那些原本被拒的学生,以填满座位。这就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可以上免费的公立大学,学生为什么应该付钱给私立高校呢?同时,即使是顶尖的私立院校,也不具有大量的非学费收入,这在财务上限制了它们打造有吸引力的教育项目的的能力。

### 顶尖私立院校与其面临的挑战

顶尖私立院校要比公立大学更容易受到人口挑战的伤害,因为它们在很多方面都和其它私立院校相似。然而,他们也在某些方面与多数私立院校不同,这让他们能规避部分人口挑战可能带来的损失。波兰私立院校

中大部分都是作为“需求吸收者”(demand absorbers)而快速、轻易地发展起来的,因为1989年秋共产主义释放了大量需求、打破了政府垄断。那么,从逻辑上看,当需求大幅下滑,这种院校将面临很大问题。相反,顶尖私立院校努力成为精英院校,为顾客提供的远不只是高等教育体制中的一个位置。

波兰的顶尖私立院校倾向于具备“准精英”的特征:与一般的院校相比,学生地位高、教师质量高。他们的很多学生都来自能够支付高学费的家庭。这些家庭愿意支付这些费用,因为院校带来的教育收益足够让教育值那个价,即使学生的选择越来越多。

教师在其中的作用相当重要。这些院校雇佣著名的、受尊敬的教授。由于这些院校集中在同时是学术和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因此,这些院校对这些教授有吸引力,且有能力支付有竞争力的工资。同样,这些院校也能吸引大学教学重点专业领域的兼职专家。

许多公立大学的教师主要致力于研究,这种感觉是合理的。相反,顶尖私立院校在教学上的投入要比在研究上的投入多得多,行政人员希望他们的教师致力于严肃的教学。然而,顶尖私立院校比普通私立院校做更多的研究,这为学生带去知识和地位。因此,顶尖私立院校获得的学术正统性是那些“需求吸收型”私立院校不可能获得的。与普通的私立院校不同,顶尖私立院校有能力与优秀的公立高校一较高下。

顶尖私立院校不能与公立院校全面竞争。因为它们并没有全力做研究,所以常常

不能在许多研究成本较高的研究领域胜出。然而,私立院校(比公立院校多地,或者比公立院校更愿意)集中精力在“需求领域”上。它们将教师质量和行政管理的灵活性用商业纽带结合在一起,的确能够在工商管理、法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与公立大学一较高下。

顶尖私立院校的灵活性是它们的国际化导向,这可以在两方面帮助扩大潜在学生的规模。首先,通过打造国际形象(国际合作、交换项目、夏季课程等),院校可以吸引国外的学生(主要)到波兰东部学习。第二,通过国际化,顶尖私立院校试图吸引国内那些重视国际化、寻求经历多样性的机会或通过语言机会拓展能力的学生。当然,只要私立院校的质量和地位在学生的心目中足够高,国际化就有好机会。

## 结论

人口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波兰的高等教育体制。正如其他国家那样,私立高等教育将比受欢迎的公立高校更受影响;但是,不是所有的私立院校都会受到同样程度的影响。少数顶尖私立院校具有准精英的特征,这一特征虽然不能全部但是可以部分庇护它们免受人口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

注:《国际高等教育》定期刊登“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the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的文章,项目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参见:<http://www.albany.edu/>。

##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成立

查强、周光礼

查强：加拿大约克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箱：qzha@edu.yorku.ca

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guanglizhou@ruc.edu.cn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遵循苏联模式成立，这是中国研发体制的里程碑事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后两者均曾是中国科学院的分部）代表中国的顶尖研究组织，在大学部门之外形成一个单独的研究体制，配备了最好的研究资源。中国科学院大学（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以此前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成立于2012年7月，这也应该被视为中国研发体制和大学部门中的一个有意义的事件。中国科学院大学也是“含着银汤匙”出生，与中国科学院由同一领导者管辖，所提供的课程与中国科学院六个分部的研究领域和学院设置相匹配。

中国科学院大学10599名教师中，282位是中科院院士（全国共有694名院士）；博士生导师5335名。这些数字远超过清华大学（目前有41位中科院院士，1832位博士生导师和9357位博士学生）和北京大学（目前有63位中科院院士，约1700位博士生导师，约7000位博士学生）这两所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尽管中国科学院大学直到2013年秋才招收本科生，但它已经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接手了约4万名研究生，其中一半是博士生。2011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当时还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颁发了4832个博士学位。这一数字让中国科学院大学位居

卡耐基分类的最高类别，在培养博士生方面甚至打败了那些最多产的美国学校。随着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创建，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拥有了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这里有个问题：中国科学院似乎将自己变成了一所大学，为什么走这一步？此外，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创建是一个单独的故事，还是其它更为重要的事件的前奏呢？

### 中国大学对科学研究的支持

在改革中国研发体制方面，特别是围绕中国科学院，长期存在讨论和争议。中国科学院从建立伊始就被强制性地赋予了“决定科学研究导向”、“制定国家未来科技发展纲要”，同时努力完成研究项目的使命。像这样，中国科学院不仅是国家最高研发顾问，还是国家科技研发中心的旗舰。然而，中国的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了一系列精英大学计划（例如“211工程”和“985工程”）发展研究。此后，优化国家研发体制、将大学作为基础研究主干的愿望就越来越强烈。

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里，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他自身也是中科院院士）认为，政府应该认可研究型大学的主导地位。他说，大学在集中研究人员、结合研究和教学、综合专业和学科以及学院气质上比研究所有优

势。他强调那些优势不仅对基础研究很重要，对应用研究也很重要，现在越来越需要用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他把10所985大学的关键研究绩效和产出作为基准，将之与中科院2004~2008年间的表现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这些大学的联合研究实力超过中科院。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有1129所大学，其中“985计划”和“211计划”选拔出了112所研究型大学。2007年，中国的大学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中国全部国际论文中占比达到84.6%。

其他一些大学对中科院的官僚主义和相对低效的模式提出了更多的批评，建议仿造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the French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或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进行改革，让它成为科技政策顾问、最高荣誉学会；同时将其从属机构委托给大学。中科院一直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不仅是国家的最高科技顾问，也是重大研究计划的执行机构，这让它处在有争议的尴尬境地。此外，尤其是基础研究，很难在计划体制下取得突破。显然，这种争论常常得到社会经济背景的呼应，高等教育已经在从苏联模式向美国模式转变。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2006~2020）》充分地将大学认定为“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并将“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特别是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视为“加速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在这一倡导下，中国政府在2012年年初启动了“2011计划”，专门支持大学通过与研究所和工业界的协同

合作，提高研究和创新能力。最近，2012年9月发布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宣布要让企业成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主体的政策（就像美国波音、美国航空航天、微软或辉瑞），同时，中国继续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优化研发体制。事实上在2011年，中国工业界贡献的研发支出占全国总研发支持的74%。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建立似乎肯定了中国研发焦点正在转向大学部门。

### 未来会发生什么？

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立之后，2013年，新的上海科技大学成立，这也是中国科学院（与上海市政府共建）麾下的大学。这所大学提供的专业学术领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部的研究所一致。同时，该校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共享同一个执行领导。更多这种类型的大学（或分拆大学）将会出现，这是不可排除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初步下的结论是：如果中国科学院作为研究执行实体的角色很快会走向终结，而且其下属研究所将被分往大学，中国的大学将在研究能力和条件上迈开一大步。毕竟，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年花费达36亿美元，拥有超过100个重点实验室和4.54万研究人员（2010年的数据）。如果中国科学院（在短期内或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现状，中国可能会看见一张不断加长的中国科学院明星研究型大学列表。许多其他中国大学可能会受益于与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日益增加、日益密切的合作。中国的新政策倡议和呈两位数增长的研发经费是推动这些发展的动因。

## 查韦斯的统治为委内瑞拉高等教育留下的遗产

Orlando Albornoz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 (the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教授

电子邮箱: oalborn@reacciun.ve

已经去世的雨果·查韦斯 (Hugo Chávez) 曾长期在委内瑞拉执政 (1999~2013), 并试图为高等教育引入许多改革措施。尽管委内瑞拉的高等教育正在实施一系列政策, 但是他当时却没能成功地反对那个计划。1830年, 大学都被收归国有。但1953年, 私立院校被允许进入学术市场。1958年, 民主革命掌权, 大学系统走向扩张和现代化。当然, 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 (Bolivarian revolution) 试图进行全面改革。但十数年过去了, 2013年的高等教育体制还是和他1999年接手时差不多。尽管高等教育结构和组织没有改变, 但国立 (公立) 大学1999年的在校生人数已达510 917人, 2011年是1 132 306人; 私立院校1999年的在校生达到299 664人, 2011年是555 198人。不过, 过去三年, 国立大学放缓了扩张的步伐。

尽管委内瑞拉的高等教育体制并不在查韦斯的手里开始, 也不会在他的手里结束; 但查韦斯还是为体制留下了一笔遗产。他新建了两所大学 (这两所大学现在是全国最大的大学) 使得几千名可能上不了学的学生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 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格证书且家境贫苦, 那些学生很少对于就读高等院校抱有期望。因此, 即使进入国家机关工作, 这些学生需要冒风险才能拿一个可以帮助他们进入人才市场的专业学位。这种扩张模仿了古巴的大学公有化模

式和把大学收归政府的做法, 这样一来, 那些自治大学就消失了。查韦斯对大学仅有一个愿景, 这个愿景是革命的目标。因此, 他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建了这些大学, 阻止这些大学变成一个多元化的知识部门。

### 1958年: 现代化

1958年, 委内瑞拉的高等教育体制确立了自治、民主治理、师资队伍专业化等现代特征, 建立了很多不同的院校, 招收了大量学生, 学生中上层阶级占多数, 而且大学能够回应社会需求。高等教育体制在全国各地大大扩张。1990年, 委内瑞拉制定了一个遴选和资助科学研究的总计划, 一些国立大学开始建立研究院。在那40年里高等教育体制发展很成功, 培养出了政治领袖和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中产阶级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就此诞生并合法化。然而, 体制的效率很低: 无法扩招以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尽管积极培训专业人士, 但他们不能开办研究型大学, 而当时整个拉丁美洲都建立了研究型大学。

### 高等教育体制

查韦斯继承了一个已经固化下来的、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制, 其中的大学和其它机构覆盖了全社会的需求, 国立和私立院校都在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然而, 其中也存在一些重要问题。1975年, 政府启动了一个

庞大的项目，资助大学生出国留学，试图加快人力资源培训。几千名委内瑞拉学生被送往欧洲和美国，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拿了专业学位回国。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巩固大学质量、从国外引进必要的师资。查韦斯在把几千名学生派到古巴的时候也犯了类似的错误。

然而，虽然人们对于查韦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革命存在很多恭维，但是他没能改变这个高等教育体制。他实施了一些政策扩大招生，试图全盘照搬古巴的大学模式完全国有化。被查韦斯政府所控制的大学变成致力于培训革命所需教师而不是市场所需专业人才的机构——不仅军国化，而且严格遵循思想教条。在他的大学治理计划中，大学管理者不仅包括教师和学生，行政雇员和体力劳动者也要参与其中。查韦斯没有试图颁布适用于全部大学的政策，相反，他建立新大学来满足革命需要而不是社会需要。他让传统体制继续运行，但引入了他自己的团体。

## 质量和未来

委内瑞拉的高等教育体制在改进质量上表现得很无能，而质量改进是许多国家和院校的目标。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

排名”和英国《泰晤士报》的世界大学排名提供的一些数据表明，委内瑞拉的大学落后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委内瑞拉的革命只是在试图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愿景，没有实施全球化和国际化策略，因此而被孤立于知识的国际流动之外。

委内瑞拉高等教育体制的未来依赖于政治和经济情况。如果查韦斯的继任者能够继续掌权，他们将加快制定法规，政府也会完全控制高等教育。然而，事实是查韦斯时代政府慷慨拨款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回。委内瑞拉将进入经济下行时期，这会引发大学之间的争斗。当然，当经费可以无限制的获得时，社会似乎运行良好，包括学术体制。重振大学的改革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

## 委内瑞拉的固步自封

查韦斯的高等教育成就很有限，他的贡献被政府的宣传工具大大夸张了。但是，委内瑞拉的自治大学和学术发展受到的损害的确很大。已故的领导人由于缺乏公众的支持，对高等教育的角色也有所误解，查韦斯在15年掌权期间采取的措施扩大了学生的入学机会，同时也让委内瑞拉变得固步自封。

## 加强老挝的高等教育

Jane Knigh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研究所 (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兼职教授

电子邮箱: jane.knight@utoronto.ca

国际化在大学能力建设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下的高等教育广泛存在竞争、品牌化、商业化前沿和中心, 国际发展合作的优先性常常很低。与精英合作伙伴建立网络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与发展中国家的院校一起开展能力建设计划的境况就不一样了。

现在是时候与发展中国家新建立的高校合作, 重新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这种行动计划为所有合作院校带来了不同的互惠互利模式, 反映出那些功成名就、经验丰富大学的社会责任和团结一致。

### 老挝的高等教育体制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可被视为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对国家发展重要性最好的案例研究之一; 也因如此, 国际学术合作对于建设和巩固高等教育体制也很重要。2012年, 老挝总人口660万, 有五所公立高校, 建校历史不足20年。老挝国立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os) 建立于1996年, 位于首都万象, 是国内最顶尖的大学。过去十年间, 还新建了三所地方性大学: 占巴塞 (Champasak, 2002), 苏发努冯 (Souphanouvong, 2001), 沙湾拿吉 (Savannakhet, 2009)。这三所大学规模较小, 旨在满足地区人口和经济的需求。医科大学创建于2007年, 坐落于万象, 致力于培养医

学专业人士。

亚洲发展银行从2009年开始支持“加强老挝高等教育计划”(the Strengthening Higher Education Project in Laos)。计划的重要一点是为大学教师提供教学、研究和管理责任的专业发展。这对地方性大学来说特别实际。例如, 苏发努冯大学坐落在北部, 在校生有3700名 (主要是本科生)。学校有6个学院, 19个系, 320个教师, 其中3人拥有博士学位, 60人拥有硕士学位, 其他老师均为本科学位。不出意料, 专业发展, 特别是学位升级在计划中是优先性最高的, 并且补充了其它发展领域的不足——例如教材、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研究生专业、研究能力、质量保障等。

### 为教师学位升级所设的奖学金

在老挝, 多数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学位升级主要通过和国外大学和合作项目实现, 大多都赋予奖学金。老挝不能提供足够的博士学位, 原因是国内大学所提供的研究生专业无法覆盖所有领域, 且容量有限。

高等教育部 (the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已经为师资发展树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要求10%的大学教学人员拥有博士学位, 60%的大学教学人员拥有硕士层次的文凭, 30%拥有本科学位。例如, 苏发努冯这个地区性大学目前83%的教学人员

只有本科学位，有硕士学位的占16%，有博士学位的教学人员只占1%。

要达到这个目标，有赖于和那些能提供研究生培训的大学合作。其次，还有赖于那些能提供财政支持的外国政府和多边机构。外国合作院校提供的入学奖学金是首选形式。外国大学在老挝开办研究生专业是可行办法之一，但是招生数有限。尽管这对某些学科来说是可能的，比如商业管理或教师培训，但是对于那些自然科学、工程和人文科学等研究生专业来讲，就不可行了。

因此，教师一般需要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要出国留学，需要满足语言要求，对国内院校的教学任务也有影响。在老挝，所有外国奖学金都要求具备额外的语言能力，除非是邻国泰国；但是，即使是在泰国，很多新的国际硕士学位和博士课程都用英语授课。因此，深造的基本要求是会讲外语。迄今为止，除了需要来源国提供奖学金外，日本、越南、韩国、中国、法国和英国都有共同的语言要求。但是对于地方性大学的教师，要在语言上达到高水平是一个挑战。提供语言培训常常是奖学金的要求之一。

### 短期的专业发展机会

不出意料，奖学金被视为大学教师不断增进教学与研究实力、最终改进老挝高等教

育的最重要方式。但是，奖学金并不是专业发展所需和受益的唯一方式。（在地区中心或邻近大学）开办短期和更聚焦的现场培训课程也很有用。在老挝，大学教师都要承担教学、研究和行政管理义务。对所有高级管理人员来说，例如校长、副校长、财务部长、人事部长和规划部长等，承担教学义务很平常。在院系层面也是如此，很多教师都有管理任务。最终的目标是将大学的管理人员专业化，这样一来，学者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开展教学和研究活动。但是这并非长期建议。同时，短期的专业发展机会以教学方法为导向，课程发展、研究设计和分析、质量保障、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也同样需要。

老挝和临近的缅甸都需要与外国大学合作开展能力建设，特别是师资培训和发展。国际合作伙伴需要在多个方面互惠，老挝大学的国际合作院系致力于发展出保障所有合作伙伴利益的战略。

国际参与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已经成为大学的战略优先事项。然而，对于那些正在发展和巩固高等教育机构和体制的国家，当下的商业化、竞争力和排名可能会危害到它们的能力建设，这是我们能够承担得起的吗？答案是：担不起。但是，这就要求我们转变国际化的价值观。

## 俄罗斯大学的新使命和新意愿

Tatiana Kastou éva-Jean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the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研究员

电子邮箱: jean@ifri.org

俄罗斯的大学正面临新挑战。在国内,俄罗斯政府要求大学不仅仅要为国家经济培养高素质人才,还要在研发创新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一角色传统上是由俄罗斯科学院(the Russian Academy Sciences)扮演的,但是它因为在改革自身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而失去了合法性。在国际上,普京总统希望到2020年有五所俄罗斯大学能跻身全球排名前100名。拥有这样的领导人,除了吸引外国留学生带来经济红利外,还会将俄罗斯的形象改进为国际教育和科研强国。尽管俄罗斯付出了努力,例如2003年加入“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但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仍然很低:2010年,俄罗斯的国际学生占全球的3.9%,其中大部分来自独联体国家(前苏联)。只有两所俄罗斯的大学跻身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莫斯科国立大学(Moscow State University)排在80名左右,圣彼得堡国立大学(Sain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排在后100名。俄罗斯走向国际领袖的道路似乎还很长。

### 起步艰难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俄罗斯的大学经历了一段困难的转型时期,期间政府拨款也不足。在拮据时期,大学必须为了生存制定新战略:包括公立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主动为教育服务提供更多经济支持(结果,

如今60%的学生都要自费入学),并且新建了地区性分校和院系来教授所需的非核心课程,如法律、经济和管理等课程。年龄老化和低收入的教师在多所大学兼职,并以教授私人课程来养家糊口。学位文凭的社会声誉也和高等教育民主化同时不断发展,这加剧了腐败行为、剽窃和买卖文凭的传播。除了少数例外,大学的培养质量普遍恶化了。

除此之外,学生数量也是未来需要担忧的因素。由于20世纪90年代人口出生率低,14~19岁的年轻人数量从2007年的1100万降低到了2012年的760万。短期和中期的人口状况是大学的一个挑战。为了避免高等教育产能过剩,关闭、重组和兼并大学显然会成为必要手段。这些过程已经在发生了:2008~2012年有88所大学关闭,学生数量减少了146万。显然,大学之间的生源竞争将在未来数年变得十分严峻。

### 有所变革……

从2005年起,政府已经在试图扭转负面趋势,并试图走向教育体制现代化。高等教育获得的政府拨款从2005年的1190亿卢布(约40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4024亿卢布(约130亿美元)。2012年10月,梅德韦杰夫总理承诺,教育开支到2020年将和国防预算齐平。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将教育和国防放在同一个优先级上。然而,即使是在顶尖大学,生均支出仍然相当低(俄罗斯

只有 8 000 美元，但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高达 14 000 美元，美国是 30 000 美元)。

为了选拔最有前途的大学，俄罗斯启动了三个卓越计划。“国立研究型大学”(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ies)和“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ies，地区合并打造的大学)成为新的质量标签，占俄罗斯全部大学的 5%。这些大学获得了大量额外的拨款，有些大学现在装备的现代设施和实验室，连西方大学都眼红嫉妒。各种措施相继实施，目的是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让大学和公司的联系更紧密，并鼓励大学创建创业公司和商业孵化器。俄罗斯政府显然受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模式的启发。

### ……但还不够?

由于一些因素被忽略掉了，因此改革的成功面临风险。首先，需要重新考虑教学和研究职业的人力资本。这将需要提高现有的工资水平——目前这仍然是多数大学的希望——和社会声誉，如此才可以吸引到最有才能的教授。另外，需要替换内部招聘制度；在一些大学，90%的教师由大学毕业生留校担任。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应付的课程、学科壁垒以及陈旧的教学方法都需要改革。每个研究人员的科学声誉应该和恰当的工资水平一样重要。最近发生了一长串学位论文剽窃的丑闻，不仅反映了高等教育体制的腐败程度，也表现出俄罗斯较低的研究水平。同时，应该消除研究和教学之间的障碍：例

如，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教师地位和研究人员的工资不同，俄罗斯教师的教学时数则要比西方同行高三到四倍。

传统的教学和研究的分离是阻碍大学完成新的国内和国际使命的第二个核心因素。2010年，大学占有所有国内研究机构的 15%，研发人才数量占全国的 6.4%，不过他们的国内研发支出占全国的 8.4%。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数字则为 26.6%。显然，大学还需要不断进步。

第三，政府试图通过走捷径建立理想模式。这种机械的方式没有考虑到很多障碍因素：自然过程的持续时间、大量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党派利益、体制惯性以及制度阻力等。这会鼓励学校在发展中使用机械、肤浅的量化指标，以满足政府部门的需要，从而维持政府拨款额度。例如，创业公司的数量可以很可观，但是他们的营业额常常很小，产品没有竞争力，在实际经济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也成问题。

第四，尽管自治大学被赋予了新的地位，但即使是俄罗斯的顶尖大学也被政府部门的主导角色和全面控制所困扰，政府部门决策任何事情都是依据各地区、各专业的学生“预算”额度以及工资和经费使用情况。当野心勃勃的发展项目没有恰当的实施机制来配合，俄罗斯的教育改革就可能会在从短期过度到中期的过程中遭遇瓶颈。考虑到激烈的国际竞争，俄罗斯的大学会面临被永久驱逐到全球教育边缘地带的风险。

## 新书快递

Bowen, William 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72 pp. \$26.95 (hb). ISBN: 978-0-691-15930-0. Web 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http://www.press.princeton.edu).

威廉·博恩 (William Bowen) 是普林斯顿前校长, 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顶尖分析人员之一, 他主要关注高等教育成本、远程教育可能的角色以及“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 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些文章最初由演讲稿转变而来, 分析之后还附加了深思熟虑的评论。

Carnoy, Martin, et al. *University Expansion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Triumph of the BR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83 pp. \$60 (hb). ISBN 978-0-8047-8601-0. Web site: [www.sup.org](http://www.sup.org).

本书考察了金砖国家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知识经济、经济回报这些背景下的扩张。书中分析的主题包括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质量、战略、大学的改革进程等等。

de Wit, Hans, ed. *An Introduc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Milan, Italy: Vita e Pensiero,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2013. 193 pp. (pb.) ISBN 978-88343-2445-5.

文集主要围绕国际化展开, 内容包括联合学位和双学位的角色、美国的国际招生、课程国际化、国际化范式的变革等等。本书

与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 (the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中心有关。

Grimaldo Durán, Humberto, and Francisco López Segrera, eds. *La Internacionalización de la Educación Superior a Nivel Mundial y Regional: Principales Tendencias y Desafío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s: Major Trends and Challenges]. Bogotá Colomb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olombia. 275 pp (hb). ISBN 13: 978-958-42-3238-0.

本书含序言和12章节内容。全球化相关的三章用英语撰写, 另外九章提供了地区、国家和个案的概述, 用西班牙语写就。

Brunner, J. Gacá-Ávila, N. Fernández, J. Cortadellas, M. L. Neves, X. Zarur, and R. Hernández. (Iván F. Pacheco) *Why Are Professors Liberal and Why Do Conservatives Ca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87 pp. (hb). ISBN 978-0-674-05909-2. Web site: [www.hup.harvard.edu](http://www.hup.harvard.edu).

这本书聚焦社会学家格罗斯 (Gross) 的一个一般假设: 美国的多数学者在政治上都“左”倾。他认为, 选择学术职业的人中间存在自我选择, 就像该职业一度偏社会主义一样。较少有保守人士选择学术界。尽管分析的对象是美国, 却涉及到政治观点的各种

主题以及世界各地学术职业的价值。

Hao, Ping.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Origi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Los Angeles: Bridges21 Publications, 2013. 421 pp. \$80 (hb). ISBN 978-1-936940-37-0. Web site: [www.Bridge21.us](http://www.Bridge21.us).

本书详细讲述了中国北京大学从 1898 年建立到 1912 年清政府终结之间的历史, 讨论了大学发展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作者是中国资深学术领导人, 提供了详细的史料。

Hendrickson, Robert H., Jason Lane, James T. Harris, and Richard Dorman. *Academic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A Guide for Trustees, Leaders, and Aspiring Leaders of Two- and Four-Year Institutions*. Sterling, VA: Stylus, 2013. 418 pp. \$45 (hb). ISBN 978-1-57922-481-3.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http://www.Styluspub.com).

为了提供美国高等教育学术管理指南, 本书考虑了影响学术机构的许多关键因素。讨论的话题包括院校的全球参与、学生体验、学术职业、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角色、学术院系的角色、校长职位、法律体制等。

Kleypas, Kathryn L., and James I. McDougall, eds. *The American-Style University at Large: Transplants, Outpost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2. 305 pp. (hb). ISBN: 978-0-7391-5020-7. Web site: [www.Rowman.com](http://www.Rowman.com).

本书主要从英语和人文专业学者的角度出发, 考察了“美式”大学不断在全球扩张的不寻常的几个方面。一些章节聚焦于世界各地的英语系, 包括中国台湾的大学。其他章节讨论了美式大学的新殖民主义、海湾国家的移植大学、文学研究的国际化等。

Montgomery, Scott L. *Does Science Need a Global Langu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225 pp. \$22.50 (hb). ISBN 978-226-53503-6. Web site: [www.Press.uchicago.edu](http://www.Press.uchicago.edu).

地质学家蒙特戈里 (Montgomery) 针对英语作为全球科研语言的角色展开了引人入胜、一针见血的讨论。他讨论了英语的历史发展以及此前其他语言是怎样扮演这一角色的问题。现在, 说英语的非英语母语人士在数量上超过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 这一情况正改变着科研共同体的特点。

Olivas, Michael A. *Suing Alma Mater: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urt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1 pp. \$32.95 (pb). ISBN 978-1-4214-0923-8.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本书分析了美国法律体制目前的趋势, 对其进行了广泛讨论。聚焦于高等教育法律问题的利益群体正不断扩大, 在这一背景下, 书中考察了 120 个法律案件, 精心归纳出过去半个世纪的六个法律趋势。

Palmer, John D., et al., ed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Globalization's Impact*. New York:

Palgrave, 2011. 230 pp. (hb.) ISBN 978-0-230-10932-2. Web site: www.palgrave.com.

尽管不是所有章节都围绕国际化展开,但本书深刻分析了全球化对几个东亚国家的影响。主题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英语课程。

Paulsen, Michael B.,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28.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3. 728 pp. \$239 (hb). ISBN 978-94-007-5835-3.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2013年的年度手册提供了13篇深度文章,有的多达50页。该书从美国的角度出发,涉及一系列高等教育主题。第28卷包括以下主题:高等教育市场的意义,研究诚信和不端行为,社会网络,美国师资培养的历史,学生参与,公共政策和学生保留,等等。

Shils, Edward. *The Order of Learning: Essays on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hilip G. Altbach).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13. 375 pp. \$34.95 (pb). ISBN 978-1-4128-5154-1. Web site: www.transaction.pub.com.

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高等教育学者,他写了关于欧洲大学发展、学术自由、学术职业、当代高等教育问题和其它相关问题的文章。本

书还收录了希尔斯的作品列表。

Smart, John C., and Michael B. Paulsen, eds.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27.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2. 564 pp. \$239 (hb). ISBN 978-94-007-2949-0.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该系列每年都出一本,今年是系列的第27本,书中提供了有关高等教育研究课题的深度文章。这套书的焦点是美国的研究和课题,但是多数章节都有显著的国际视野。作者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重要研究人员。本书的主题包括:学术职业的群体生态、高等教育国际组织的角色、本科生的政府资助项目、高等教育私有化,等等。

Smith, Larry, and Abdulrahman Abouammoh, eds. *Higher Education in Saudi Arabia: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3. 194 pp. \$129 (hb). ISBN 978-94-007-632-3.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本书聚焦沙特阿拉伯高等教育研究的相关知识,收录的文章关注了学术现实的重要方面。各章讨论的话题都由一位沙特学者和一位国际学者共同执笔,包括私立高等教育、医学教育、教师、认证和质量保障、教学,等。

